

## 清朝國史館建置與史書 編纂研究：以《本紀》為討論中心\*

王一樵\*\*

本文主要討論清朝本紀纂修體裁與清朝史官們兩者間的互動，以及修史體例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演進，並由此觀察清朝國史館的修史制度與史館建置。研究方法上，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相關檔案史料，配合各種已出版檔案文獻，試圖重建清朝國史館的成員組織與建置。此外，筆者

---

\* 本文承蒙莊吉發、邱添生、王汎森諸教授教正，並蒙本刊審稿人提供改進意見，謹此深致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博士研究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工作人員。



結合滿、漢文檔案文獻，綜合分析清代國史館纂修本紀的史料來源與纂修過程。本文討論的第二個問題，集中於晚清史館纂修「本紀」中所透露的歷史思維演變，並由此來討論史官集體纂修「本紀」的具體實例。第三部分，筆者主要利用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大清德宗景皇帝本紀稿本》，及其書頁中粘貼之刪改簽條，討論清代纂修本紀的集體修史建置，並分析其中反映的修纂方法與史學體例。

關鍵字：清朝國史館、史書編纂、本紀、史館建置、《大清德宗景皇帝本紀稿本》



## 一、前言

清朝國史館作為清朝纂修史書的常設機構，始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聖祖下詔開國史館，纂編太祖、太宗、世祖前三朝史書，其後書成撤館。<sup>1</sup>雍正元年(1723)九月，清世宗詔命續修，增康熙朝為四朝國史。後於乾隆元年(1736)再度開史館編修前五朝史事，乾隆十四年事竣裁撤。乾隆三十年六月為纂修功臣列傳，又再度開館，自此便形成常設官署機構。<sup>2</sup>迄於清亡，清朝國史館於宣統三年(1911)為北洋政府接管，其間經二百餘年的發展。總計該館先後共纂修清朝歷代紀、志、表、傳及大清一統志、皇清奏議等各類史書四十餘種。<sup>3</sup>此外，該館更在纂修史書的過程中，

<sup>1</sup> 據清人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所載，此次開館計纂辦完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統稱為：《三朝功臣傳》。參見：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爵秩類·國史館職掌〉，1301-1302。

<sup>2</sup> 王鍾翰，〈清國史館與《清史列傳》〉，收於氏著，《清史新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257-278。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1994)，6、65、283。王鍾翰，《清史補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266-273。鄒愛蓮，〈清代的國史館及其修史制度〉，《史學集刊》4(2002.10)：37-4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153983-001，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禮部為奉諭開國史館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以下簡稱《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

<sup>3</sup> 清朝國史館纂修檔案種類數目，據鄒愛蓮統計為四十餘種。現存於世的清朝國史館檔案，主要分別保存於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及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秦國經、高煥婷的統計，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清朝國史館檔案共1147卷，計有42605件。另據馮明珠的統計，國立故宮博物院現存史館檔，含清朝國史館與民國清史



制定編輯相關章程、規則、凡例、條例，以及各種辦法。<sup>4</sup>並在修史過程中，形成功課檔、分校檔、閱簽檔、考勤檔、史館檔、長編檔等各類檔案文獻。

回顧前輩學者的研究，如王鍾翰、陳捷先、莊吉發、喬治忠、張鵬年、鄒愛蓮、馮明珠等，都曾就史館建置、修史制度、史館檔案等方面撰有專著論文，提出相關看法。<sup>5</sup>前人的相關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礎，但同時也指

---

館檔案。本紀部分，總計994筆。志的部分，食貨志、兵志、河渠志、地理志、禮志、選舉志、職官志、樂志、天文志、災異志、時憲志、輿服志、儀衛志、刑法志、藝文志、邦交志、交通志、國語志，總計有5243冊。表的部分，共有1050冊。傳包部分，計有3536包。傳稿部分，計有8300餘冊。長編檔部分，計有3477冊。此外，尚有《大清國史列傳》1270餘冊，約共15000餘位清代重要職官的傳記資料。另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目錄」，史語所收藏清朝國史館相關檔件計有322筆。相關數據見：秦國經、高煥婷，〈清朝修史與《清史稿》編纂研究〉，《清史研究》3(2002.08)：11-16。馮明珠，〈鉅編零簡，匯為淵藪：「史館檔」的滄桑與展望〉，收於《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11.02-03，73-10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目錄），〈<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index.htm>〉，檢索日期：2008年9月17日。

<sup>4</sup> 前人相關討論中，對「史書」與「史籍」，並無嚴格區分。然「史籍」所稱範圍較「史書」為大，據《尚書正義·尚書序》，史籍者，因史所書，謂之史籍。本文主要依據清朝國史館之凡例，將史書專指清朝國史館按正史體例所纂修者，兼及歷代所修之正史。參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臺北：新文豐，2001）第二冊，卷1，〈尚書序·附釋音尚書注疏〉，20。

<sup>5</sup> 參見：莊吉發，《清代史料論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馮明珠，〈清國史館人表屬辭則例：兼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國史館檔大臣年表〉，《故宮



引出更多有待處理的議題，例如史官成員編制的細部情形、史館機構名稱的演變、集體修史制度如何運作等等，都有待更深入的討論。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典藏檔案文獻的開放，以及檔案出版與數位化日漸普及，為進一步的研究清朝國史館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此，筆者試圖利用國內各典藏單位收藏之檔案文獻，並配合已出版的各類清朝國史館檔案進行研究。主要以清朝國史館的「本紀」的纂修為討論中心，針對此議題作綜合性的討論。<sup>6</sup>

## 二、 紀綱舉要：清朝國史館修纂「本紀」所體現的史學思想

唐代劉知幾(661-721)曾在《史通·本紀》中指出：「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sup>7</sup>「本紀」作為中國傳統體例，在傳統史學的演進上，一直是正史纂修的基礎。「本紀」者，本於《春秋》之經，紀、經二字同義，法《春秋》之宗旨，而以書、表、

---

學術季刊》22·3 (2005)：91-130。王記錄，〈清代史館的人員設置與管理機制〉，《史學史研究》4(2005)：44-54。此外，近年來也有學者由史館纂修《國史儒林傳》的成書過程，探討嘉、道以來的思想文化，如王汎森的研究。參見：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3)：63-93。

<sup>6</sup> 近年來出版的檔案，例如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編輯的《清國史館奏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整理與建置的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等等，提供研究者極大的便利。參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編，《清國史館奏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4。

<sup>7</sup> 唐·劉知幾撰，蔡焯、浦起龍編釋舉要，《史通通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卷2，8a。



列傳為緯。<sup>8</sup>體例上，本紀為一書之綱，舉其大要，以俟志、傳發明。內容上，本紀是「載一帝之事，而分見於志、傳之中也者」。<sup>9</sup>清朝國史館延續傳統史學體例，於有清一代，纂修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等朝本紀。至宣統年間，又纂修德宗本紀，雖僅成稿本，但體例完備嚴謹。<sup>10</sup>清朝國史館除纂修有漢文本本紀外，尚纂修有滿文本本紀。清朝史官亦詳考「本紀」提綱大要之意，表現在滿文本本紀的名稱上。史官特取「hergin」兼具「網緣之紀綱」與「理法」之意，將「本紀」之滿文寫作：「da hergin i bithe」，表示出融合滿漢文化的特色。<sup>11</sup>在保存裝飾上，滿漢文本皆飾以黃綾封面，分函裝貯，一般稱為「黃綾本歷朝本紀」。<sup>12</sup>另外，就「本紀」的內容形式而言，清朝史官在編年上以清朝年號正朔繫年，但其行文中對於明季諸事，與邊疆大吏多依實載入，以補《實錄》所記之不足，並作為得失興亡之鑑。這種以史為鑑的作為，反映清朝主政者對於歷史的看重，也表現出對傳統史學的延續。由於「本紀」作為史書纂修之根本，故凡探究史學纂修、修史制度，以及修史

<sup>8</sup> 劉知幾，《史通通釋》，卷2，8a。

<sup>9</sup> 關於本紀體例的討論，可參考劉成炘《史學述林》一書，劉氏在書中闡明「本紀」體例之意義，並綜合多家說法，剖析深刻。參見：劉成炘，《史學述林》，收於劉成炘著，黃曙輝編校，《劉成炘學術論集·史學編(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373-378。

<sup>10</sup> 莊吉發，〈清史館與清史稿：清史館未刊紀志傳的纂修及其史料價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11，未刊稿，139-139。

<sup>11</sup> 羽田亨，《滿和辭典》(臺北：學生書局，1998)，202。

<sup>12</sup> 莊吉發，〈清史館與清史稿：清史館未刊紀志傳的纂修及其史料價值〉，139-139。



體例，必由此而入門徑。以下將從清朝國史館纂修本紀(以下簡稱為「清本紀」)之體例，以及相關纂修凡例入手，由此展開討論。

### (一)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清本紀及其凡例

誠如近代著名國學家劉咸炘(1896-1932)所言：「蓋史之有例，乃集眾修書、整齊故事之不得不然。」<sup>13</sup>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甚為重要。本節擬透過傳統史學的批判角度分析清朝本紀修纂凡例的內容，由體例來分析其中對於史學傳統的延續與創新之處。從清初五朝(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的本紀修纂〈凡例〉來觀察清朝史學思想，可看到清朝史館史官深受傳統史學編纂體例的影響，同時卻也反映出滿族入主中原的時代特點。<sup>14</sup>〈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凡例〉的內文中，反應出融合中原漢文化與滿蒙文化的歷史書寫體例：

一太祖高皇帝事實從詳，諸臣諸國事從略，俱右詳具本傳。一切制度第舉大綱，餘載於本志。而大事特書者，亦舉大綱，如史書本紀體例。一所重寶訓，詳見《實錄》。本紀，紀事之文，惟與

<sup>13</sup> 劉咸炘，《史學述林》，528-529。

<sup>14</sup> 本文主要討論清朝國史館纂修之漢文本紀，關於滿文清本紀，陳捷先已有詳盡討論，參見：陳捷先，《滿文清本紀》：臺北，明文書局，1981。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381。據莊吉發統計，清朝國史館黃綾本滿漢文本紀，包括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等十朝本紀，總計690冊，漢文本共490冊，滿文本共200冊。參見：莊吉發，〈清史館與清史稿：清史館未刊紀志傳的纂修及其史料價值〉，144-145。



事相關者，則類及之，餘則詳見各志傳中。一未即位以前，事屬創興，多不書日。即位後規模新定，然後書日者多，詳略一因乎時。一年有關者，悉照《實錄》，不為增改。一明季政事及所用邊疆大吏，《實錄》所未詳載者。紀中補入之。蓋興亡成敗，兩兩相形，則得失之故瞭然矣。<sup>15</sup>

該〈凡例〉吸收本紀體例的同時，不只強調本紀「紀事之文，惟與事相關者，則類及之，餘則詳見各志傳中」的特性。而且也將草原民族特有的貝勒、台吉稱號的體例，於〈凡例〉中作出詳細規畫。

相較於〈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凡例〉，〈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凡例〉不但延續前述之成例與書寫特色，並對於書寫體裁與史家書法作出更為詳盡的規定：

一太宗文皇帝時，規模大定，凡建官錫爵，定制立法，其詳具載於諸志。茲特書其大綱，而辭不敢繁，事不敢略，從本紀之體例也。一朝賀祭祀諸典禮，係特舉者，悉書；其已載入太祖高皇帝紀中者，不復書。一太宗文皇帝續太祖高皇帝之緒，恭行天討，四征不庭。凡親歷行間者，具書其詳。其命將出師，但載廟謨指授。及奏捷大略，其戰功之詳，分載各傳。一太宗文皇帝詔諭，載在《實錄》甚詳，皆有關於立國之宏模，及恤民懷遠之至計。

<sup>15</sup> 此篇〈凡例〉附於《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上卷)卷首。《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是書共分兩卷兩冊，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見：《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國史館進呈黃綾本)，上卷卷首，文獻編號：201000506。





謹撮其切要者，書之本紀，不敢遺漏。一我朝誕膺天命，太宗文皇帝始改有天下之號曰：「大清」，而實無利天下之心。與明議和諸書，一一載入，以昭盛德。<sup>16</sup>

〈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凡例〉中對於體例格外重視，對於如何達到「辭不敢繁，事不敢略」的史學書寫要求，有特別詳細的規定。文中明訂「何事書，何事不書」的纂修凡例。不過，清朝史官在處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議題上，則是彈性的運用史家筆法，強調大清與大明之間的議和，而非相爭天下神器之位。在傳統史學體例的大原則之下，〈凡例〉中表現出清朝史官的智慧，與其融合滿漢文化的微言大意。〈大清五朝本紀凡例〉對於「本紀」的體例規定，在條目與史家書法上更加展現出對於史學體例的思索與闡釋。內文如下：

一本紀為綱，志傳為目，史書體例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基東土。太宗文皇帝規模大定。世祖章皇帝奄壹區夏，撥亂致治。聖祖仁皇帝以守兼創，躬致太平，渥澤深仁六十餘載。世宗憲皇帝紹休聖緒，厚民之生，正民之德，釐工熙績，緯武經文。五聖相繼，而守一道，盛德駿業，具載《實錄》。謹舉大綱，恭列本紀。其諸臣及藩國事實各詳列傳，不敢略，亦不敢冗也。一本紀以記事為主，而帝王之事，莫大乎詔令。恭讀五朝寶訓、聖諭與古典謨訓誥相並，謹擇重大切要者，具載原文，以昭謨烈，顯承之盛。

<sup>16</sup> 〈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凡例〉附於《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冊一卷首，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見：《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國史館進呈黃綾本），冊一，文獻編號：20100508。



其可約舉者，則敬舉大要書之。與志傳相關者，詳諸志傳。<sup>17</sup>

由上文可見清人爲因應國史館集體修史的情況，而以「本紀修纂凡例」作爲史官修史的指南方針，進而構成纂修本紀的共同史裁取捨準繩。綜合而言，清朝史館爲纂修本紀所作之〈凡例〉，不僅在內容上符合傳統史學對於體例的要求，也符合唐代劉知幾所論：「天子事爲主，大事編年以書之」的史書纂修法度。<sup>18</sup>而凡例的本身，在史學意義上不但象徵著清朝國史館延續傳統史學的體例，也反映著其在機構建置上延續集體修史的官方史學傳統。

## (二) 清朝國史館本紀纂修中的得與失

唐劉知幾曾對《史紀》提出批評：「區域既定，疆理不分」的批評。劉知幾認爲，周朝由后稷至西伯，秦朝由伯翳至秦莊襄王，皆未稱帝，而實爲諸侯。是故司馬遷在此處，該作〈周秦世家〉以代替〈周本紀〉、〈秦

<sup>17</sup> 〈大清五朝本紀凡例〉附於《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上卷卷首，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此外，筆者在調查整理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的過程中，另檢得《五朝本紀凡例》稿本一份，此本《五朝本紀凡例》內載有刪改校對凡例的相關記載。目前該稿本目前尚未刊行與上網公開，參見：《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國史館進呈黃綾本），共二卷二冊，文獻編號：201000506、201000507、201000752、201000753。《五朝本紀凡例》稿本，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編號：278680-001，無年月冊檔。

<sup>18</sup> 劉知幾：「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參見：劉知幾，《史通通釋》，卷2，8b。



本紀》。<sup>19</sup>同樣的史學難題，也出現在清國史館的〈本紀〉修纂上。從《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凡例》中所記可知，從清太祖(1559-1626)肇基東土，立國於盛京，便以「本紀」體例書之。史官記述清太宗(1592-1643)時，則於〈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凡例〉中用：「一我朝誕膺天命，太宗文皇帝始改有天下之號曰：『大清』，而實無利天下之心。與明議和諸書，一一載入以昭盛德。」以太宗建國號之事為主，兼敘議和的方式，以表彰開創諸帝之盛德。<sup>20</sup>

而〈大清五朝本紀修纂凡例〉對於順治皇帝(1638-1661)，採取的是：「世祖章皇帝奄壹區夏，撥亂致治」的歷史定位。<sup>21</sup>至於剿平三藩，開疆拓土的康熙皇帝(1654-1722)，該凡例採取的是：「以守兼創，躬致太平，渥澤深仁六十餘載。」的歷史定位。<sup>22</sup>經由〈大清五朝本紀修纂凡例〉中用辭行文的方式，可以發現到由於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歷史背景，造成在纂修「本紀」時，對於滿洲開創先帝的重視與歷史地位的提升。史官們巧妙地以「五聖相繼，而守一道」的敘述，將本紀的體例與滿洲先室加以結合。<sup>23</sup>

入關前的國初建置，清朝史官多採取書寫年號的方式，並不別立「世家」以載入關前的國家大事。〈大清五朝本紀凡例〉對於入關前的諸事記載，採取下列方式。對於記年干支皆繫於各年之下，強調「事必繫日，日

<sup>19</sup> 劉知幾，《史通通釋》，卷2，7b。

<sup>20</sup> 《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冊一卷首，〈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凡例〉。

<sup>21</sup> 《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上卷卷首，〈大清五朝本紀凡例〉。

<sup>22</sup> 〈大清五朝本紀凡例〉。

<sup>23</sup> 〈大清五朝本紀凡例〉。



繫月，月繫年」的史法重要性。對於天命年號之前的史事，由於事屬創興，故多不書日。自天命之後，書日始多。這種史家書寫的方式，雖然考量到清朝初期在滿洲史事的書寫。但對於順治朝入關初期，皇父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攝政時之政事，則又顯示出對於史事的隱晦不書。<sup>24</sup>

〈大清五朝本紀凡例〉對於皇父攝政王的歷史書寫，主要是採取以下的標準：「順治元年，車駕未臨京師以前，攝政王諸諭不載入，其關於機要者附書。」<sup>25</sup>凡例中對於如何書寫清初國家政事的安排，顯示出清朝史官對於皇權正統性的重視，以順治皇帝是否已駕臨京師，來安排攝政王相關史事記載之取捨。這種安排顯然是合於劉知幾所述「本紀」的體例，但是回顧《史記》篇章的安排，「本紀」的體例，不一定完全沒有彈性。這種在「同中容異」、「異中求同」的史家技巧，或許正是清朝史官的高明所在。亦可見在榮耀先世的同時，清朝史官們對於清朝歷史的認識，仍然是在尊重傳統史學的基礎上發展而成。

### 三、多民族與多語言的歷史書寫：清朝國史館史官建置與本紀纂修

#### (一) 清朝國史館史官的多民族與多語言特色

本文對於清朝國史館建置的考證，雖受限於檔案文獻的內容與形式。關於其內部機構建置並無文獻記載，故目前僅能由該館各項章程、辦法及與各機構官署往來文移咨呈中加以討論。但綜合目前學界研究成果，仍可

---

<sup>24</sup> 〈大清五朝本紀凡例〉。

<sup>25</sup> 〈大清五朝本紀凡例〉。



知清朝國史館於道光朝前設有總纂處、滿纂修房、漢纂修房、長編、收掌、謄錄、滿校對、漢校對、鈔報、呈送等處。光緒、宣統朝時，又相繼增設滿總纂處、漢總纂處、長編股、奏議處、滿文移處、漢文移處、蒙古文移處、表傳處、十四志處、四傳處、畫一處、大臣傳處、承發房、點撥股、滿堂、蒙古堂等等。<sup>26</sup>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軍機處檔·月摺包》所附同治三年(1863)國史館獎敘人員清單，以及相關摺件，可以看到清朝國史館史官建置所呈現出的多語言性與多民族特色。在語言方面，史官成員包含漢、滿、蒙三種語言的史官人員，並設有翻譯專業的官職。多民族上，從理藩院的各民族筆帖式，到滿族宗室成員，漢族大員都在史館中擔任重要職務。<sup>27</sup>此外，據《軍機處檔·月摺包》相關摺件，筆者發現國史館的建置與史官成員，與《清史稿·職官志》有相當大的出入。據《清史稿》所載，清朝國史館設國史館總裁一名，該職特簡無定員，職掌國史纂修。設清文總校一人，由滿洲侍郎內特簡。設提調官，分成滿、漢、蒙提調官，各二人。總纂官，分成滿洲總纂官四人、蒙古總纂官二人，漢總纂官六人。設纂修官，協修官，皆無定員。設校對官，分滿校對官、漢校對官、蒙校對官各八人。光

<sup>26</sup> 鄒愛蓮，〈清代的國史館及其修史制度〉：38。

<sup>27</sup> 《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文件編號：098495，同治三年八月十二日，補繕宣宗成皇帝實錄黃綾本告成出力人員請獎由。《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文件編號：098496，同治三年八月十二日，謹將在館始終出勤奮格外出力人員開單呈覽由。《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文件編號：098497，同治三年八月十二日，謹將始終出力人員呈覽由。



緒年間，增置筆削員十人。<sup>28</sup>但對照《清史稿·職官志》記載，以及史館與各部院衙門往來移會檔案文件，可發現國史館建置與史官職銜名稱與《清史稿》記載出入甚大，列舉如下：清朝國史館，設國史館總裁一名，亦設有總裁大學士的職銜。設副總裁一名，與總裁、總裁大學士皆有原官職名銜，但於國史館中充任總裁。其下設清文總校，但不只一名而已，據檔案文獻可知有多至四十三名的情形。<sup>29</sup>清文總校不一定是由滿洲侍郎內特簡，亦有由宗室成員，三口通商大臣等出任。<sup>30</sup>史館內另設有提調官，分滿提調官、漢提調官、蒙古提調官。除纂修官、協修官外，尚設有幫纂官。除校對官外，國史館亦設有翻譯官、謄錄官。其中謄錄官，分滿洲謄錄官、蒙古謄錄官。此外，清朝國史館更設有收掌官，分滿收掌官、漢收掌官、蒙古收掌官，之外更設有候補收掌官一職。

關於史館成員規模，據鄒愛蓮統計，一般情況下該館建置之編纂人員為一百餘人，佐職雜役二百餘人，至光緒年間時達到六百三十二人。鄒氏更據檔案考訂，指出按宣統年間史館之職官設置，主要計有：總裁、副總裁、清文總校、滿提調、漢提調、蒙古提調、幫提調、總纂、協修、筆削員、校對、收掌、謄錄、供事。此外，見於清代各朝之史館職官，尚有呈

<sup>28</sup>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15，志九十，〈職官二·國史館〉，3312。

<sup>29</sup> 《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097059，無年月摺，請派國史館清文總校人員名單。

<sup>30</sup> 《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097059，無年月摺，請派國史館清文總校人員名單。



送、記名、額外記名、幫辦、傳頭、幫傳頭、股頭、點撥員等等。<sup>31</sup>筆者透過臺灣地區各單位典藏之清朝檔案，進一步考訂出清朝歷代史館職官設置，尚包括：國史館額外漢校對官、國史館額外滿校對官、五朝國史館滿纂修官、五朝國史館收掌官、五朝國史館監修總裁官、五朝國史館繙譯官、五朝國史館提調官侍讀、署侍讀、滿謄錄官、滿協修官、滿校對官、紙匠、皂役等等。<sup>32</sup>

其次，官署滿漢文名稱上，筆者發現清朝國史館相關檔案中的滿文官署名稱，在公文書寫上並無統一格式。就日本學者羽田亨編著的《滿和辭典》所載，國史館的滿文官署名稱為：gurun i suduri kuren。但據《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相關記載，檔案中多書為：gurun i suduri bithe weilenre guwan，以及gurun i suduri guwan。<sup>33</sup>筆者查閱《御製增訂清文

<sup>31</sup> 鄒愛蓮，〈清代的國史館及其修史制度〉：37-43。鄒氏文中將清朝國史館人員職掌分成三類，第一部分：總裁、副總裁等，是史館最上層的領銜者，直接向皇帝負責。第二部分、纂輯人員，其中提調官負責提協調度，既是最高的行政管理人員，負有管理之責，又是具權威的史籍審定者。總纂、纂修、協修是國史館編纂隊伍的主體成員，直接的執筆人員。第三部分，校對、收掌、謄錄、供事等佐雜職員，負有史書纂修工作前期查書、後期繕寫校對的佐助之責。該部分成員眾多，職掌龐雜，並有許多纂修、協修一身二任，即是編纂工作人員、又是查考校訂人員。

<sup>32</sup>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記錄有供職於史館的相關人員姓名，甚至包括皂役與紙匠的姓名，參見：《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166424-001，咸豐元年六月，國史館為更換火印腰牌由。

<sup>33</sup> 據日本學者山田恒雄《滿洲語文語辭典》，weilenre一辭為「工事」，語意不符「國史館」之意。是故gurun i suduri bithe weilenre guwan之中，weilenre一字疑有誤，正確應作weilere。參見：山田恒雄，《滿洲語文語辭典》（橫濱：丸井圖書出版株氏會社，1987），903-904。羽田亨，《滿



鑑》、《新編清語摘抄》、《滿漢大辭典》等書，於國史館條下則登載為：gurun i suduri kuren。<sup>34</sup>由此可知清朝國史館的滿文官署名稱，在辭典工具書與檔案文獻間存在著差異。此外，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中另見有「五朝國史館」此一官署名稱，除漢文檔案外，亦見於滿文檔案。「五朝國史館」的官署名稱，滿文寫作：sunja jalan i gurun i suduri bithe weilenre guwan。<sup>35</sup>《清實錄》也載此官署機構漢文名稱，可互為證明。<sup>36</sup>王鍾翰亦曾利用《清史列傳》討論五朝國史館之名稱，亦為一證。<sup>37</sup>綜合而論，此發現或可補官書記載與辭典之不足。凡此種種，皆反映出清朝國史館在歷

---

和辭典》，181。清朝國史館的滿文官署名稱，參見：《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093045-001，乾隆五年十一月，禮部知會儀制司案呈咨文。《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103749-001，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禮部為知會事儀制司案呈知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047173-001，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來保題覆國史館謄錄官議敘侯選。

<sup>34</sup> 國史館相關詞條參見：清·傅恒，《御製增訂清文鑑》，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20，〈部院類·第十一〉，76b。安雙成等編著，《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關克笑等編著，《新編清語摘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sup>35</sup>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102251-001，戶部為歲底領過並存剩紙硃彙奏事咨文，乾隆八年六月。

<sup>36</sup>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351，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853-854。內載：「又諭，大學士伯張廷玉年將八十，不能復兼監修總裁之任。大學士公傅恒著充五朝國史館監修總裁官，劉統勳著充總裁官，劉綸著充副總裁官。」

<sup>37</sup> 王鍾翰，《清史新考》，260。王氏書中所引例證，參見：《清史列傳》（臺北：中華書局，1962），卷22，〈納親傳〉，13a。





史演進中的諸多變化發展。

史官成員方面，呈現出清朝國史館另一重要特色，也就是多民族、多語言的史官成員。清朝國史館在史官成員安排上，包含滿、漢、蒙的史館官員。其次，則是史官來源的多樣性，除國史館的人員外，還有來自吏、戶、禮、刑部的筆帖式與主事官，除此之外內務府、理藩院、東陵、西陵的相關人員亦是史館纂修史書時的工作成員。<sup>38</sup>這種多元化的特性亦反映在語言的使用上，除滿文與漢文的編修外，蒙文人才亦是重要史館成員。從表中可看到蒙纂修官、蒙提調官等相關的史館職務，反映出清朝「滿蒙一體」的思維，以及清朝對於漢族文化的吸收與涵化。多元化、多語言的清朝史館特色，直至晚清時亦保持著這樣的史學現象。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軍機處檔·月摺包》內便有對於修纂滿文列傳的相關記載：

國史館總裁大學士臣孫家鼐等謹奏。今將進呈過大臣裕德、連順、崧蕃春，滿列傳四篇。敬謹繙譯清文與漢字一併恭呈御覽。伏祈皇上訓示。謹奏。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日。國史館總裁大學士臣孫家鼐。國史館裁大學士學部尚書榮慶。國史館副總裁大學士臣陸潤庠。國史館副總裁大學士臣鹿傳霖。總校官理藩部右侍郎臣

<sup>38</sup> 《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文件編號：098495，同治三年八月十二日，補繕宣宗成皇帝實錄黃綾本告成出力人員請獎由。《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文件編號：098496，同治三年八月十二日，謹將在館始終出勤奮格外出力人員開單呈覽由。《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文件編號：098497，同治三年八月十二日，謹將始終出力人員刊呈覽由。《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文件影像編號：175436，宣統元年二月初三日，內務府有關國史館各編纂敘獎議由。



恩順。<sup>39</sup>

這段史料提供具體例證，說明清朝史書的纂修是多語言，亦是眾多相關專業官員，如理藩院、翻譯官、蒙纂修官等翻譯與邊政官員所組成的多元史學成員。另一件無年月摺件，也提供相同的佐證：

應派國史館副總裁名單：吏部左侍于式枚。度支部有侍郎紹英。  
禮部左侍郎景厚。學部左侍郎寶熙、右侍郎李家駒。法部左侍郎紹昌。署農工商部左侍郎熙彥。理藩部左侍郎達壽、右侍郎恩順。<sup>40</sup>

## (二) 清本紀的史料來源

清本紀採用的史料來源，從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各朝本紀與其修纂凡例來觀察，並配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可獲得一個大致的概況。內閣大庫檔案中保存相當多有關國史館向內閣典籍廳行文照會，要求移交相關檔案文獻的移會文件。如乾隆七年七月，五朝國史館為纂修《清聖祖仁皇帝本紀》并各項志書，向內閣典籍廳行文照會，要求該廳移交相關書籍供五朝國史館修纂本紀志書之用。據五朝國史館收掌官發出的移會，可知國史館纂修所需的檔冊史料的種類，計有《平定三逆方略》一部、《治河方略》一部、《省方聖典》一部。<sup>41</sup>該移會文檔其後

<sup>39</sup> 《軍機處檔·月摺包》，文件檔案編號：184777，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日，孫家鼐等奏呈進滿列傳四篇。

<sup>40</sup> 《軍機處檔·月摺包》，文件檔案編號：189705，宣統朝無年月摺，應派國史館副總裁名單。

<sup>41</sup>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096749-001，乾隆七年七月十八日，五朝國史館為移取各項書籍事。



附有五朝國史館所開各項書單一紙，詳載該館修史所需文獻典籍。<sup>42</sup>

另據乾隆五年十月內閣典籍廳的致五朝國史館的相關移會行文，該廳移交國史館的相關檔冊，還包括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十一日登極詔書至康熙三十六年所有詔書條款。此外覆文裡亦記載典籍廳保存詔書條款，相沿年久，故多有保存不全的情況。為解決史料文獻不全的難題，該廳特就此知會國史館另行文禮部移取歷年詔書條款，以便相互斟酌校對。<sup>43</sup>由以上的記載，清朝國史館在纂修本紀的史料來源，主要以內閣典籍廳與禮部保存的歷年詔書條款，以及各類志、傳、銘、集與行述、事實冊與各類方略。

此外，有關清朝史館纂修歷朝本紀的相關記錄，從《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中也可見到道光朝纂修《仁宗皇帝本紀》的記載。由此檔案文獻，可知纂修程序上，先待實錄館完成《實錄》之初步修纂後，依序

<sup>42</sup> 計有：《日圭思永集》五本、《曹培源志銘》一冊、《賀貞婦傳》一冊、《楊邱氏節婦并孝子楊申錫事實》一冊、《二貞女傳》一冊、《楊日進事實》一冊、《荊貞女傳》一冊、《張宸傳》一冊、《朱在廷志銘》一冊、《葉映榴傳》一冊、《劉貞吉碑志》一冊、《劉夢金詩傳》一冊、《劉道深行述》一冊、《曹一士傳》一冊、《曹炯墓志銘》一冊、《蔡貞烈女傳》一冊、《孝節婦曹氏傳》一冊、《錢起盛詩賦》一冊、《張錫懌志傳》一冊、《曹泰曾傳志》一冊、《陸鳴珂傳》一冊、《周銓傳》一冊、《徐元植傳贊并周易嘉會》五冊一套、《周金然傳并文集》拾陸本一套。參見：《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096749-001，乾隆七年七月十八日，五朝國史館為移取各項書籍事。

<sup>43</sup>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096730-001，乾隆5年10月，內閣典籍廳所存詔書條款相沿年久多有不全為此知會五朝國史館行文禮部移取事。



進呈。其後，方由國史館派員謄錄《實錄》副本，以此作為修纂本紀之依據。<sup>44</sup>由乾隆朝纂修《聖祖本紀》、嘉慶朝纂修《高宗本紀》、道光朝纂修《仁宗本紀》的相關檔案文獻，可知清朝國史館隨著史書纂修繕寫經驗的累積，漸漸形成相關的規章條例、纂辦程序、與史料搜集整理的體系。<sup>45</sup>甚至，就保存維護圖書文獻而言，清朝史館每年六月初六日晾曬內府國史典籍之事，亦漸成北京民間習常見聞。其後，此事更為朝鮮使臣金箕性(?-1811)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奉使赴京時所聞見，而被登載在其使臣紀行錄《燕行日記》中。<sup>46</sup>綜合而論，就史館制度的發展而言，清朝國史館已展現出多機構相互支援，充分達成保存、維護與整理利用政府文書檔案的進步特色。

#### 四、晚清的歷史縮影：清朝國史館與《德宗皇帝本紀》的纂修

本節將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大清德宗景皇帝本紀稿本》的內容與其書中所附的刪校簽條，來對清朝國史館修纂本紀的體例與史料來源進行說明(《大清德宗景皇帝本紀稿本》以下簡稱為《清德宗本紀稿本》)。此外，由於《清德宗本紀稿本》屬於完成修纂本紀前的稿本，故可由此稿本

<sup>44</sup>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編號：096730-001，道光四年五月，內閣典籍廳為移覆事。

<sup>45</sup> 《軍機處檔·月摺包》，編號：000128，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朱鴻奏請纂修本紀事。

<sup>46</sup> 金箕性，《燕行日記》，收於夫馬進、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第一冊(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據日本天理大學藏本影印，2001)，卷2，〈習俗法制〉，347。



而查考清朝修纂本紀時所需的史官人員規模與其史家筆法體例，具有極高的第一手史料意義。其次，該稿本作為傳統史學體裁，以及清朝國史館纂修的最後一部本紀。《清德宗本紀稿本》的本身，就具有相當的史學史意義。體例方面，《清德宗本紀稿本》按年分冊修纂，一年之中又分成春、夏、秋、冬四冊。每冊稿本前都會書明總纂官與纂修官的姓名。就筆者目前的調查，《清德宗本紀稿本》目前的裝訂是按年將春、夏、秋、冬四分冊修裱成一冊。

《清德宗本紀稿本》的首冊是從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冊開始，該冊檔由於某些作業上的錯誤，因而歸於《穆宗皇帝本紀》之末冊。幸而經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內的學術先進指點，提示關鍵之處，筆者才得以順利從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室中調閱出《清德宗本紀稿本》的第一分冊，突破前人研究上的瓶頸，對此書進行全面的研究與統計。經檢閱確認後，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德宗本紀稿本》從同治十三年(1873)十二月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皆完整無缺，保存完好。除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為一冊外，其餘皆一年分為春、夏、秋、冬四冊。從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三十四年，總計一百三十七冊。由相關檔案文獻可知，《清德宗本紀稿本》的纂修，動員極大時間與人力。除總裁官一名，副總裁官一名，總纂官三名，此外尚有纂修官與幫纂官合計十二名，共計十七名相關人員參與其事。<sup>47</sup>由此可見，宣統朝雖是清朝國祚將盡之時，但清朝國史館史官仍完成了《清德宗本紀稿本》的修纂。可見其看重國史的態度，與動員人力、物力集中心力於史

<sup>47</sup> 《大清德宗景皇帝本紀稿本》(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共一百三十七冊，文獻檔案編號：201000445-201000478。



書的修纂，頗有令後世深思之處。

此外，從一百三十七冊的《清德宗本紀稿本》書頁中粘貼的刪改簽條，亦可發現到在稿本完成後，史官們尚進行修改刪定的工作。並且經由《清德宗本紀稿本》中粘貼的簽條，可以對清朝史官們的修史過程與方法獲得一個大致的了解。清朝國史館在修纂本紀稿本時，主要的參考史料為《實錄》。其次是相關的諭旨、《實錄》稿本、本紀凡例、《清德宗本紀稿本》等。就史學方法而言，《清德宗本紀稿本》不單只是傳承傳統史學中，本紀按《實錄》而修的體例。由於清朝國史館修纂此書採取的是集體修史的方式，大量的史料經由史官們整理成篇後，再逐步撰就各稿本，最後形成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德宗本紀稿本》。其後，再由史官負責對《清德宗本紀稿本》進行刪改，形成今日在書頁中所見的粘貼簽條。

這些改刪的簽條，據其內容加以分析，多半是史官們用於討論本紀稿本中內容的取舍。其行文的語氣，並非是絕對的指示，而近於向上級官員請示的方式。改刪的簽條以「似可不書」、「似可不載」的方式註明意見，且多半附有刪改意見、檢查史料，比對內文出入的結果。這些改刪的簽條，有時也會在不經意中反映晚清史官對於涉外事務的態度。例如《清德宗本紀稿本》，光緒四年秋季冊，頁 10 中就粘貼一張簽條上面寫道「辦教案一條可刪。」該簽條所刪校內文為：「丙午，諭何璟、吳贊誠，妥辦烏山教案。」另外，《清德宗本紀稿本》，光緒三年(1877)春季冊，頁 12 亦有一簽條上寫：「用西洋通例五字可刪。」所刪校內文；「甲寅。用西洋通



例，裁撤駐英副使。」<sup>48</sup>這種對於涉外事件的刪改，反映的心態相當獨特，某一方面則呈現晚清歷史書寫中對西力東漸的排斥。最後我們可以在《清德宗本紀稿本》，光緒三年秋季冊，頁 7 中，看到清朝國史館史官對於外交事務的書寫策略：「辛未下一條擬全刪。涉外交事似以少載為首。」該簽條所刪校內文：「辛未。以江漢關稅紉，恐誤俄糧兌價。諭李鴻章籌撥他款，勿失信外人。」<sup>49</sup>

無論是對西洋通例的反感，還是刪去教案與外交事務的相關記載，在在反映出傳統史學對於天朝的理想，面臨著時代的變局。晚清的史官們不得不對現實世界的變化作出回應，而在字裡行間留下了刪改的註記。《清德宗本紀稿本》雖然是未完成的稿本，但它卻正好保存下大清帝國在歷史上的最後身影。歷史巧妙安排下，原本透過欽定本所無法看見修纂史官的姓名，以及原本無法看到的那些位於刪改簽條之間所記憶的晚清世局，卻都經由《清德宗本紀稿本》而得以呈現。雖然它原是未盡的史學著述，但時間的昇華，讓它產生更深遠的歷史意義。

## 五、結語：作史之法與讀史之識

劉咸炘曾引申章學誠《文史通義》之義，對史學之本質作出詳盡的討論。他指出：「史學有二，一曰：『作史之法』，二曰：『讀史之識』。」

<sup>48</sup> 《大清德宗景皇帝本紀稿本》(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光緒三年春季冊，文獻編號：201000447，012。

<sup>49</sup> 《大清德宗景皇帝本紀稿本》(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光緒三年秋季冊，文獻編號：201000447，007。



作者有識，乃成其法。讀者因法，而生其識。雖二而實一也。法者，撰述之義例，章先生所謂『圓而神』者也。識者，知政事、風俗、人才變遷升降之故，孟子所謂『論其世』者也。」<sup>50</sup>劉氏此論讓人深思傳統史學的深層意義，除在規矩完備，合於體例之外，更重要的在於追求對於史事的識見。即能知其人，且能論其世，兩者合而為一。不但讓史家透過史書傳達識見，又能由史家之撰述增進廣大讀史者之見識。正是傳統史學由嚴謹的體例下，進一步開展的人文關懷。

本文除制度層面、史學體例層面的討論外，其關懷之所及正是史學傳統的延續。也就是，由「何以為紀」的史學問題，更進一步的思索至「何以為繼」的文化思想問題。筆者以為任何的研究，必立定在前人的基礎與傳統上，更進一步的擴大討論的廣度與深度。誠如五十年前顧頡剛(1893-1980)對於中國史學的討論，他在綜結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時，曾一針見血指出：「凡是一門學問的研究，都有它的延續性，後人的研究大部是繼續前人的工作，或是受前人的影響和啓示；不能一刀兩段的把它分開了，說這是五十年來的史學，那是五十年前的史學」。<sup>51</sup>即便在五十年後的今日看來，顧氏的評論依然有其不可忽視的時代意義。當時代漸漸脫離民國時期的排滿革命史觀時，清史也漸漸不再只是一個對於腐敗政權的註記。新一代的清史研究者，以及清史的纂修者，該如何進一步承繼屬於自

<sup>50</sup> 劉咸炘，《治史緒論》，收於劉咸炘著，黃曙輝編校，《劉咸炘學術論集·學術講義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222-223。

<sup>51</sup> 顧頡剛，〈五十年來的中國史學〉，收於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據黨史委員會藏民國三十四年重慶勝利出版社刊本影印，1976)，201。





己的史學傳統，並加以延續。該如何「作史有法，讀史有識」，其中的各種問題與挑戰，都成為當代清史研究者不可迴避的重大課題。劉師培(1884-1919)有言：「則史也者，掌一代之學者也；一代之學，即一國政教之本」。<sup>52</sup>筆者以為經由清朝修史制度的研究，正是清史研究者「明史法、成史識」的首要第一步。

---

<sup>52</sup> 劉師培，《左盦外集》收於氏著，《劉申叔先生遺書》，下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卷8，〈古學出於史官說〉，1477-1479。



## 參考書目

### (一) 檔案與官書文獻

1. 《大清太宗文皇帝本紀》，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國史館進呈黃綾本，文獻編號：201000508、201000509、201000510、201000511、201000754、201000755、201000756、201000757。
2. 《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清國史館進呈黃綾本，文獻編號：201000506、201000507、201000752、201000753。
3. 《大清德宗景皇帝本紀稿本》，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檔案編號：201000445-201000478。
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
5. 《五朝本紀凡例》稿本，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編號：278680-001，無年月冊檔。
6. 《軍機處檔·月摺包》，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7. 《清史列傳》，臺北：中華書局，1962。
8.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目錄），〈<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index.htm>〉。
10. 夫馬進、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據日本天理大學藏本影印，2001。
11.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編，《清國史館奏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4。
12. 劉知幾撰，蔡焯、浦起龍編釋學要，《史通通釋》，臺北：文海出版社，



1964。

13. 傅恒，《御製增訂清文鑑》，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2、23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4.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
15.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全二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 (二) 中文專書

1. 王鍾翰，《清史新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2. 王鍾翰，《清史補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
3. 安雙成等編著，《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
4.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5. 莊吉發，《清代史料論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6. 陳捷先，《滿文清本紀》，臺北：明文書局，1981。
7. 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8. 劉咸炘著，黃曙輝編校，《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9. 劉咸炘著，黃曙輝編校，《劉咸炘學術論集·學術講義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10. 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據黨史委員會藏民國三十四年重慶勝利出版社刊本影印，1976。
11. 關克笑等編著，《新編清語摘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 (三) 中文論文

1. 鄒愛蓮，〈清代的國史館及其修史制度〉，《史學集刊》4(2002.10)：37-43。
2. 馮明珠，〈鉅編零簡，匯為淵藪：「史館檔」的滄桑與展望〉，收於《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11.02-03，73-101。
3. 馮明珠，〈清國史館人表屬辭則例：兼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國史館檔大臣年表〉，《故宮學術季刊》22·3(2005)：91-130。
4. 王記錄，〈清代史館的人員設置與管理機制〉，《史學史研究》4(2005)：44-54。
5. 莊吉發，〈清史館與清史稿：清史館未刊紀志傳的纂修及其史料價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11，未刊稿，139-139。
6.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3)：63-93。
7. 秦國經、高煥婷，〈清朝修史與《清史稿》編纂研究〉，《清史研究》3(2002.08)：11-16。

### (四) 日文辭典與工具書

1. 羽田亨，《滿和辭典》，臺北：學生書局，1998。
2. 山田恒雄，《滿洲語文語辭典》，橫濱：丸井圖書出版株式會社，1987。



Research of “Guoshi-guan” and Compile of National Historiographies in Qing  
Regime: “Ben-ji” as a Major Agenda

I-Chiao, Wa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essay use “Ben-ji”(biographic sketches of emperors) as a major agenda to discuss and investigate “Guoshi-guan”(Academia Historica), which was th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compile institution in Qing regime. From the first historiography appear in Ancient China to Qing regime, “biographic sketches of emperors”(Ben-ji) plays a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especially in memorizing and representing behaviors of emperor. This essay will focus on functions of Benn-ji, which connecting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area in historical text. The officers of “Academia Historica” in Qing regime use the regulations of Ben-ji to compare to ancient canons. Secondly, I will use the Manchu and Chinese language archives to restore organization and members in th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compile institution in Qing regime. Finally, I will analysis and discuss the rough draft of Gung-xu emperor’s biographic sketches. Use it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 to find out the historical memory in late Qing regime.

**Keywords:**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Guoshi-guan) in Qing Regime, Compile of Historiography, Ben-ji, Orga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Guoshi-guan), The Rough Draft of Guang-xu Emperor’s Ben-ji

